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近代上海 闸北居民社会生活

张笑川著



JINDAISHANGHAI
ZHABEIJUMIN
SHEHUI 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袄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70 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分租界之势”：闸北华界的崛起与演变	20
一、清末民国上海城市的华界、租界格局	20
二、开埠后闸北的城郊化	28
三、闸北“通商场”的开辟	36
四、民国年间的兴旺与顿挫	51
五、租界的扩张企图与华界的抵制行动	61
第二章 依傍租界的工商业区	83
一、华界工厂发源的大本营	83
二、商业的初步发展	105
第三章 矛盾丛集的市政	123
一、成就与差距：市政设施的艰难演进	124
二、自治与官治：市政管理权的争夺	146
三、两县之间：民初的“闸北区域问题”	158
四、华洋之间：以桥梁、水电为中心	174

第四章 中下层移民为主的城区	197
一、人口密集的城区	198
二、中下层聚居区	201
三、移民与流动人口聚居区	206
第五章 活跃的地方绅商	214
一、工商社团的组建和商业精英的涌现	214
二、慈善团与救火会	228
三、闸北保卫团	243
第六章 左翼文化与工人运动	256
一、左翼文化重镇	256
二、工人运动沃土	261
第七章 棚户区	271
一、棚户最密集的城区	271
二、棚户区的生活	273
三、政府的救济措施	279
第八章 煤油灯下的世界——消费、犯罪与城市景观	288
一、低消费区与低档次娱乐	288
二、犯罪多发区	291
三、无序的城市景观	293
四、日益低落的闸北“形象”	295

第九章 战争笼罩下的社会生活	301
一、二次革命之恐慌	302
二、江浙战争之波及	303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主战场	307
四、两次淞沪战役之致命打击	309
 结 语	324
 附 录	338
附录一 1903—1927 年闸北市政机关沿革简表	338
附录二 1928 年闸北工厂分布表	339
附录三 1937 年八一三战前闸北工厂分布表	345
附录四 1903—1926 年闸北道路修筑表	349
附录五 1929 年闸北棚户分布统计表	352
 参考文献	357
 后 记	374

绪 论

整个世界正在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有人计算 1990 年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37%，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 60%。中国是这股浪潮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步入世界著名城市之林。这激起了人们研究中国城市的热情。

近代中国的城市中，上海无疑最为耀眼。在当代上海日新月异的同时，人们对“老上海”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上海很大，有欧洲风情的外滩，有古香古色的老城隍庙，有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有宽敞现代的浦东……这些各具特色的社区共同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上海，每个都折射出上海不同的面貌。每一个社区有不同的发展轨迹，也有不同的历史记忆，不但居民的成分不同，他们对于上海的体验也不会相同。从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社区着手，追寻近代上海城市的足迹，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本书讲述的“闸北”，就是近代上海的一个社区。今天的上海人或许知道，火车站、长途汽车总站在那里，闻名近代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曾在那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中的宝山路血案在那里，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的战场曾在那里，看过电视剧《上海滩》的朋友或许还知道主角之一“丁力”的家曾在那里……近代的

闸北是如何演变的？是什么样的居民住在那里？它与其他社区是什么关系？它在上海城市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过去的闸北与现在的闸北有什么联系？这就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农村为基础相适应，中国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注重对农村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政府的基础从乡村移入都市”的转变。^[1]遵循学术随世变而转移的规律，城市史亦有理由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热点。但是长期以来，城市史研究的热潮并未如期出现，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于城市的定位有关，此处不拟深入讨论。当然，不能说历史学中完全缺乏对城市的研究，但这主要是在“地方史”的概念下进行，研究对象的“城市”属性并未成为论述的焦点。一般来说，只有在“城市意识”萌发的基础上，“城市史”研究才成为可能。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展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急速推进，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中国城市史研究逐渐兴起。其中，中国近代城市史，更成为海内外中国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2]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日趋兴盛，城市史研究如何深化，成为学界面临的一个主要课题。

何一民曾把目前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概括为四个领域：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史研究，近代城市总体研究，关于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3]我们便以此为基点，探讨近代城市史研究四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可能的学术生长点。

所谓单体城市研究，是以某一特定城市为单元进行的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等四部篇幅宏大、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都属于此类型。单体城市研究无疑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单元，进一步深化城市史研

究无非以单体城市为基点,向内和向外扩展。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与互动,就是通常所说的区域城市或城市体系研究;再进一步,通过区域城市体系之间关系的探讨,则可以达到对全国性城市体系和中国城市特征的宏观把握,即所谓城市总体研究。然而向外扩展有赖于向内深入,对于城市的宏观把握必须以对具体城市内部结构、发展过程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因此,另外一个深化城市史研究的方向就是深入单体城市的内部。通常的做法是把某一单体城市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作纵向切割,分别予以探讨,或者就城市中某一现象、某一阶层、某一人群、某一组织进行专门研究,即何一民所概括的第四种类型。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深入理解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的一种有效途径,但隐含的前提是往往把城市视为一个均质的空间,忽略了城市内部不同空间、不同社区的差异。因此,城市史研究内向的深入,在坚持以上途径之外,有必要引入城市社会空间差异的视野,开展不同城区历史的研究。

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因此城市是具有空间属性的。首先,由于城市作为一种人类聚落形态的出现晚于乡村,城市一般总是由特定的乡村转化而来,因此某一地域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过程,也是其空间性质的转变过程。其次,随着城市的不断成长和变迁,城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也随时处于变动之中。

秉承对“空间”要素的重视,城市空间结构首先受到城市地理学的关注。按照城市地理学的视点,城市化过程,一方面是某一地域均质化的过程,一方面是某一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在功能上逐渐分化的过程。城市的内部空间可以按照功能差异区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交通区、文教区,也可以按照“中心—边缘”结构区分为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等。^[4]在功能分化以及历史、文化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一步导致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社会结构的分化。不同的城区由

于区位不同、功能各异,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差异,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社区。正是有鉴于此,美国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芝加哥学派,最早开始注重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在它的推动之下,社会学中逐渐兴起了关于城市社区的研究,并成为城市社会学中的重要研究视角。^[5]此外,城市经济学也充分注意到城市不同社会空间对于城市经济的不同功能和作用。总体来说,以上学科的相关研究彰显了城市空间属性的深刻意义和丰富内涵,使我们对于城市有更立体的理解。但是,无论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还是城市社会学,更多立足于对现实城市空间状况的分析和解读,而较少注意时间维度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也缺乏对于城市空间过程的长时段考察。作为众学科参与、交叉所形成的城市学的组成部分,城市史研究在坚持自身学科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以上学科的空间视角,展开对城市空间分异和演变的研究,或许会为全面把握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城市的空间过程作出独特的贡献。

“城区史”概念的提出,就是借鉴空间视角,向内部深化城市史研究的一种尝试。它不同于传统上将城市作为一个单一整体,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分别考量的做法,而是将城市看作一个充满差异的社会空间,从城市内部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异、分化、互动、发展中更深入地理解城市。由于地理学、建筑学的影响,“城市空间”问题一直是西方城市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随着公众史学的蓬勃发展,城市社区史更成为热点。^[6]反观国内城市史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出现此方面的理论思考。如,承载针对上海史研究提出了“城市社区史”的概念,并指出“对近代上海城市社区发展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上海城市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分区域、不分对象的某些城市社会史专题研究,无助于完整地展现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风貌,因而也难以做到科学地、客观地总结上海城市社会发

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7]近期,苏智良亦以上海城市史研究为例提出“城区史”概念,并对其研究路径与方法进行理论探索,对城区史的定义、城区的划分、城区史研究的内容、城区史研究的意义等各个方面都有细致的论列。^[8]虽然承氏、苏氏提出的概念略有不同,但是旨趣一致,都意识到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作为一个均质的空间,而是要充分注意到城市空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城市不同社会空间历史的研究,深化对城市的认识和理解。

如果说城市首先是人类的一种聚落形态,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结合方式的社会属性是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区史”和“城市社区史”这两个概念就可以统一起来,“城区史”可以看作是“城市社区史”研究的更简洁表达。^[9]它把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型都市,分解为各具特色的城市社区,分别研究不同城市社区的历史及其在整个城市中的功能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城区历史、功能、特点的比较与综合,达到对城市整体历史和特点的深入理解。

关于城区史研究的具体内容,苏智良曾概括为三个方面。^[10]这个研究内容设定,充分吸取了社会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很全面,但似亦有关关注点过多之嫌,循此而往,很容易成为大而全的产品,也冲淡了历史学对于历史过程的关注和强调。笔者认为,若更精练和具可操作性的话,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由于特定城区总是有一个由农村型社区向城市型社区的演变过程,因此,首先应该研究特定区域城市化的过程,描述其融入城市整体的过程及其发展演变,解释其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二、特定的城区总是所在城市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必然需要从城市整体的角度,考察城区的功能及其与其他城区的差异和联系。三、深入城区内部,探讨其社会结构、社区权力、居民构成、社区认同、文化风貌等方面,这一方面的深入考察是前两方面研究的基础,因此应该是城区史研究的重点。